

数智时代孝道伦理的实践困境及其调适路径

尤吾兵

摘要: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养老服务领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动能,智能设备的普及显著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效率与可及性,为孝道伦理实践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在数智技术日益嵌入养老照护关系的过程中,孝道伦理实践也面临着重重困境。以孝道所涵盖的“孝知、孝情、孝意、孝行”四个维度为框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技术融合过程中孝道伦理实践面临“孝知窄化、孝情淡化、孝意弱化与孝行虚化”等困境。其根源在于技术效率逻辑对伦理逻辑的遮蔽、孝道主体性的技术消解以及相应制度环境建设滞后。破解这一现代性困境,重塑适应数智时代的孝道伦理,需要驯服算法效率霸权、重拾孝道价值内涵,破除技术僭越藩篱、复归孝道主体本真,构筑伦理生态防线、涵育孝道责任沃土等。数智时代孝道的传承需在技术中嵌入人文精神,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从而守护“善事父母”的伦理内核。

关键词: 数智时代;孝道;孝道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2-0119-10

《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10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2.0%^[1],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呈现加速演进态势。国家统计局新近公报表明,2024 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骤减至 954 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 6.77‰ 的低位水平^[2]。这种“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叠加效应,使得传统养老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以算法驱动为核心的数智化浪潮正深刻重塑着养老图景。当前,数智技术已深度嵌入养老日常照护、智能穿戴设备应用及各类养老服务平台运营之中,成为养老场景中极具影响力的要素。但是,随着数智技术的持续演进,对传统孝养文化形成多维度的冲击,引发养老生态的深层变革。在数智技术构建的新型养老范式下,技术逻辑的过度扩张,催生出“打卡式尽孝”“表演性孝行”“数据化赡养”等现象。此类现

象不仅弱化了传统孝道所承载的情感厚度与伦理深度,更潜藏着代际情感疏离、家庭功能弱化等现实风险,甚至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

当前,学界关于数智技术对传统孝道影响的研究,在关注度与深入性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通过知网检索“数字”“数智”与“孝”等关键词发现,相关发文量仅个位数。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体在养老应用中的安全、隐私等问题,同时附带讨论了其对孝道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智技术本身的特性对传统孝养文化构成潜在冲击。例如,技术的泛化与工具理性可能削弱孝文化的权威性,使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3]。二是数智产品应用对孝道中情感维度的消解。孝道的最高境界在于子女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而护理机器人等数智产品不能完全取代人,它们呈现的是虚拟的“人工情感”,无法对老人的情感需求作出有效

收稿日期:2025-08-19

项目基金: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传统‘色养’文化的基因识别与‘活化’利用研究”(AHSKZ2021D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怀伦理视阈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支持系统构建研究”(23BZX094)。

作者简介:尤吾兵,男,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012)。

回应^[4],造成一种人机之间的“单向度情感”缺陷^[5],从而消解孝道中的情感因子。三是数智技术对传统“尽孝关系”产生重构效应。尽管护理机器人等数智产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在父母养老中的缺位,但也容易造成代际孝养关系的疏离,甚至引发孝道实践层次的降阶^[6]。总体来看,目前尚缺乏专门对数智技术赋能孝道实践过程中所衍生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路径的系统研究。因此,在技术深度融合于养老实践的背景下,探索具有前瞻性的调适路径,以应对数智技术对孝道实践造成的困境,已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一、数智时代孝道伦理实践困境的表征

孝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核心范畴,其本质始终围绕“善事父母”的实践理性展开。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7]这揭示了孝的原始意涵,即子辈对亲人的赡养与承继。《孝经》则进一步将这种孝养行为升华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提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8]237},并具体阐明了赡养父母的实践要求,即“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8]254},构建起了涵盖物质供养与精神关怀的孝道实践范式。当代孝文化研究学者则通过社会心理学视角,突破传统伦理的平面解读,提出孝道可划分为“孝的认知层次(孝知)、孝的情感层次(孝情)、孝的意志层次(孝意)、孝的行为层次(孝行)”^{[9]7}四个层级。这不仅为分析传统孝道提供了多维解剖图,更为考察数智技术对孝道实践造成的影响确立了分析框架。

(一) 孝知窄化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淀,传统孝道内涵具有丰富的层次性。《盐铁论》中“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身”^[10]的经典论述,揭示了孝道实践的立体结构,从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养身”,到保持和颜悦色的“养色”,再到满足父母精神期许的“养志”,三者共同构成孝道的多维实践框架。可见,孝伦理本质上既深植于“亲亲之爱”的血缘亲情,又包含“养终身之年”的责任担当。

然而,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着当今社会对孝道认知的路径。算法是推动数智技术发展的核心要素,而算法运行的逻辑在于精准匹配用户偏好以提升黏连性。当涉及“孝道”内容传播时,算法

平台更倾向于推送那些迎合受众喜乐的、能带来即时反馈的碎片化和娱乐化信息。例如,短视频充斥着大量“给父母购买新奇礼物”“带父母体验网红餐厅”等视觉化、场景单一的内容。这类信息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孝道实践已被简化为可被快速展示、易于获取社交反馈的瞬时行为。而孝道背后所要求的恒久关怀、深刻理解与情感韧性等核心价值,却在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中逐渐隐没。长期浸润于此种信息环境,年轻群体用户对孝道的认知图式极易被潜移默化地重塑。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逻辑与量化管理思维结合,正在催生一种“数据化孝道”。部分养老服务平台推出的“孝心积分”体系就是典型代表。该体系通过精密算法,将子女赡养老人行为拆解为可测量、可比较的数据点,如电话、视频通话的频次和时长,线上红包或转账金额,为父母网购物品的快递数量等。这些数据经算法加权,最终生成直观的“孝心排行榜”。由此可见,数智技术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正深度介入当代孝道认知的建构过程,传统孝道所蕴含的立体、丰富、充满人伦温度的多维度价值——从日常的“精神慰藉”到关乎生命终极意义的“慎终追远”,都在算法构建的认知图景中被不断简化和扁平化。当孝道的内涵被压缩成可量化、可视化的行为指标时,其作为伦理实践的多维性认知便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压缩”。

(二) 孝情淡化

儒家文化一向将“孝”视为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情感流露。《诗经》中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11]。这揭示了孝道情感的本质是对生育、养育之恩的本能回馈。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12]212}的体悟,认识到父母养育子女过程的艰辛、漫长,故而主张把“三年之丧”作为普遍性的情感表达与终极关怀。在日常生活中,孝的情感性特征表现更为显著,孔子提出的“敬养”理念便是最好例证。“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2]15}由此可见,孝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在心底怀有对父母的“敬、顺”之情。

然而,数智技术正以其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悄然改变着这种以情感为纽带的孝道实践逻辑。从情感培育的基础看,数智技术构建起的虚拟世界,虽然为交往带来了便捷,但却可能挤占现实中的代际互动空间,弱化孝道情感培育需要的亲子间互动经历。

如“AI(人工智能)情感代理”的兴起就是典型例证。针对独居老人,这些设备扮演着“电子孝子”的角色。它们可以精准记录父母结婚纪念日并推送祝福,依据算法推荐昂贵的“长寿套餐”等。更值得深思的是AI情感欺骗现象,例如,部分老人将对亲情的渴望投射于AI技术生成的“假靳东”等虚拟形象,进行深度情感倾诉^[13]。当数智技术编织的虚拟关怀以“永不疲倦”和“完美人设”的姿态高频出现时,相比之下,真实子女偶尔的电话问候或探望便显得仓促且敷衍。而在孝道实践的表现形式上,数智技术评价体系的介入,进一步催生出“表演性孝道”。当孝行被纳入可量化、可比较的积分系统,子女的赡养行为极易异化为满足算法评价指标的符号化操作。例如,“打卡式关怀”成为常态——定时定点的电话或视频并不是源于思念或关切,而是为了积累通话时长积分;线上红包的发送或网购物品的频率,更多考虑的是其在积分公式中的权重,而不是父母的实际需求与心意。在此情境下,子女的关切被简化为可执行、可验证的技术任务,“晨昏定省”的传统美德异化为“表演性节目”。孝道的“敬、乐”情感内核,在技术中介的层层过滤下被稀释和抽离。

(三) 孝意弱化

儒家伦理把孝道践履的显著标志凝练为“敬养”,而孔子通过对“色难”的阐释又揭示了这一实践的困境。《论语·为政》中有:“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2]16}对“色难”困境的理解,历代注疏虽然在细节上有争论,但主旨高度一致,即认为孝道的最高价值不在于“食养”,而在于子女在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对父母的“敬养”,但“敬养”需要强大意志力来保障,即需要“孝意”来支撑的伦理实践。朱熹对此也有论述:“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14]其中,“深爱”所要求的这些“敬养”体现,正是需要通过超越本能冲动的道德意志来实现的。有学者从心理学视角进一步指出,孝意是“身为子或女者对父或母及其相关事物的良好行为意向或反应倾向”^{[9]29}。其把孝意理解为将血缘情感升华为伦理责任的意志转化,而这种转化既需要认知上的价值认同,又是意志层面的自我约束与持久坚持的体现。

数智时代的到来,数智技术的即时满足机制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悄然消解着孝道实践所必需的长期持久性与责任意识。一是

孝意从持久性向即时性转变,导致其自身的褪色。传统孝道强调“养终身之年”,要求子女以恒久的耐心与毅力,持续关注并满足父母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这种长期投入不仅是时间的累积,而且需要意志的加持。然而,数智技术营造的社会环境,倾向于提供即时、快速的满足感。当传播孝道相关内容时,算法会推送那些能迅速引发情感共鸣的“短、平、快”信息,这些信息使年轻群体误以为孝养可以轻松、快速地完成,无须经历漫长的时间考验和持续的意志磨砺。孝养从“终身慕”滑向“瞬时秀”,孝道实践变得浮于表面且缺乏内涵。二是孝意的价值取向发生异化,从道德自觉滑向功利选择。数智技术构建的评价体系将孝道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如通话时长、红包金额、购物频次等,这些外在的数字符号逐渐成为衡量孝心的标准。在这种语境下,子女的赡养行为极易异化为满足算法评价的技术操作,而非内心的情感流露。当孝道实践被纳入功利主义的计算框架,其背后的道德责任感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当孝道失去了其作为人伦实践的艰难承诺时,孝养所依托的孝意便日益脆弱。

(四) 孝行虚化

传统孝道不是悬于空中的概念,而是深深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有学者在心理学框架内明确提出,“孝知与孝感可能互相影响,两者又皆可能影响孝意,而孝意则可能影响孝行(孝道行为)”^{[9]29}。此论断深刻揭示了孝道实践的内在逻辑:孝知、孝情、孝意皆为孝行的准备阶段,孝道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落脚于亲身的伦理行动。《论语·里仁》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12]43}的训诫,其核心关切正在于确保子女能在父母身边履行奉养之实。孔子强调“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12]5},此“力”即指向具体可见的赡养行为与关怀实践。传统孝行的社会实践形态丰富而立体,涵盖日常起居的物质照料、情感慰藉与精神陪伴,以及节日团聚、祭祖仪式等承载文化意义与家族认同的代际互动仪式。可见,传统孝道始终将亲身实践与真实互动视为维系代际伦理的根基。

然而,数智技术在提升养老“效率”的同时,也暗藏使孝行陷入“虚化”的危机,其机制在于数智技术的形式化操作替代了真实完整的伦理实践。一是虚拟交互侵蚀具身实践,技术代理瓦解真实互动。数智技术的虚拟性,在无形中挤压了代际具身化、在场性互动的时间与空间。远程健康监测设备或许能传输父母的生理数据,却无法传递指尖的温暖与目

光中的牵挂;自动送药机器人能精准递送药品,却无法替代病榻前端水送药时的那份忧戚与守护。还有算法驱动的“线上关怀”,如高频次的网购礼品配送、定时的自动问候信息,它们以算法的精准与“永不倦怠”的姿态提供着看似完美的情感反馈,表面上似乎提升了“效率”,实则可能造成深刻的错觉:将便捷等同于尽责,将符号化馈赠等同于情感传递。这种虚拟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情感投射,不仅无法建立真实、双向、富含张力的情感联结,而且可能麻痹子女对父母真实情感需求的感知能力,钝化其亲力亲为的伦理自觉。二是代际仪式遭遇虚拟解构,文化传承的深度被消减。传统孝道中的代际互动仪式,如春节团聚、生辰共庆、清明祭扫,是家族血脉与文化认同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是“慎终追远”伦理精神的具体实践场域。《论语·学而》中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2]然而,数智技术的虚拟化正在解构着这些仪式的神圣性与完整性。视频通话中的“云团聚”固然能传递音容,却难以复现围炉夜话的温暖氛围与肢体互动的亲密;在线祭扫平台提供的虚拟献花、点烛等固然便捷,却抽离了亲临墓前、培土拂尘所承载的敬畏之心与家族集体记忆的唤醒力量。当孝行被数智技术中介层层包裹,其实践所必需的具身性、情感性与文化厚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虚化”,这种“虚化”最终将使传统孝道滑向异化。

二、数智时代孝道伦理实践困境的成因

数智时代孝道伦理的实践困境是由技术效率逻辑对伦理逻辑的遮蔽、孝道主体性的技术消解以及相应制度建设的滞后造成的。这三者相互交织,使得孝道这一珍贵的情感实践有被技术操控的可能。

(一) 技术逻辑层面:算法效率至上过滤孝道多维价值

在技术逻辑层面,数智技术的发展以算法为基座。算法深嵌于社会运行肌理之中,扮演着资源分配者与价值筛选者的角色。其本质是基于可量化数据展开训练筛选、实施自动推荐以及构建价值过滤系统,且将优化目标严格限定为效率最大化。算法因效率至上原则而形成一种无形的技术霸权。这种霸权,正如学者所界定的:“利用占有算法的优势地位支配和控制资源,导致算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使其成为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主导力量。”^[15]因此,孝道所蕴含的情感真挚度、伦理责任以及精神深度等

难以量化的价值维度,在算法的这种运行框架下,往往会遭到系统性的过滤与消解,从而陷入实践困境。

算法功能的发挥高度依赖海量历史数据的训练。然而,这种对数据的依赖构成了孝道伦理陷入实践困境的初始诱因。算法如同“惰性的、没有意义的机器,直到与数据库配对才能正常工作”^[16]。在筛选与孝道行为相关的数据时,算法缺乏主动的伦理反思与理解能力,只能机械地筛选数据表面的相关性,而算法必然偏好那些易于捕捉、存储和计算的显性指标,如消费金额、互动频率、服务购买记录,而将“情感真挚度”“精神慰藉质量”等隐性价值维度无情地排除在外。这种筛选不是偶然的技术缺陷,而是由算法的效率优先逻辑与数据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导致的。更关键的是,历史孝道行为数据本身可能就隐含着某种偏差,如过度强调物质赡养而相对忽视精神陪伴的功利化倾向。算法不仅会直接接受这种偏差,而且通过筛选逻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失衡。例如,有的养老服务或电商平台依据用户的消费记录和购买偏好,筛选出“购买高价养老产品”或“预订高端养老服务”,将其直接等同于“尽孝”,并持续向用户推送相关商品信息。这种诱导性信息流实质上是在引导用户将孝心表达简化为消费行为,容易导致孝道实践与其人伦本质渐行渐远。

算法推荐虽能提供具体的尽孝提示,但其工具性逻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孝道伦理的粗暴降维。算法将丰富多元、情境依赖的“尽孝”行为,压缩为一套可量化、可执行、可监控的“任务清单”:每日视频通话时长达标、每月探望次数满足最低要求、特定节日的礼物消费额等。这种标准化推荐完全漠视了个体在生活境遇、情感需求以及家庭关系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每个家庭的情感表达与责任履行都拥有其独特的节奏和内涵,算法的“一刀切”标准显然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更为严峻的是,用户对这种简化版、任务化的数据,会形成反馈信号回馈给算法。算法基于这些数据,将愈发热衷于推荐那些形式浮夸、易于量化、能快速吸引用户互动的“尽孝”内容。而用户在算法持续的诱导和平台营造的“尽孝排行榜”“孝心值”等量化氛围下,为了追求社交认可或完成平台设定的“孝道任务”,往往会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去迎合这种肤浅化、表演化的标准,易使孝道的真实情感内核与伦理责任日益空洞化。

算法的价值过滤机制是导致孝道陷入实践困境的深层原因。算法价值过滤机制是算法运行逻辑的

固有特点,它会像“过滤器”一样,对你所做过的事情进行挑选,查看你喜欢的事情,并试图推断你的喜好。也可以说,算法会根据情况不断筛选并呈现个性化信息,为用户构建了一个量身定制的虚拟世界,这样算法以可量化指标为优化目标,将孝道中的情感、责任等不可量化的价值排除在外。例如,长期照料病患父母所带来的情感损耗,因无法量化而被算法自动忽略。以一些养老 App(应用程序)为例,它会将“子女探望次数”纳入社区排名,结果导致老人被迫接受频繁但短暂的无效探望。这种将探望行为简化为数据点的做法,忽视了不同老人的实际需求。另外,算法无法处理孝道实践中的情感损耗问题。长期照料病患父母的子女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职业发展影响等隐性成本,因缺乏标准化评估体系而被算法忽略。需要明确的是,算法在此过程中并无主动的伦理恶意,其破坏性源于其运行逻辑的固有缺陷——对不可量化的“价值过滤”。在算法的效率计算中,责任、义务、情感深度等伦理维度的权重为零,这无疑是对孝道多维价值的严重侵蚀。

(二)主体性层面:过度依靠技术消解个体的伦理主体性

传统孝道实践的精髓在于子女奉养行为与其内在道德意识紧密联结,彰显着个体作为伦理主体的自觉与能动性。人的主体性指的是“在生产实践中表现为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交往中的自我意识等”^[17]。主体性不仅是人之为道德主体的根本依据,而且是个体在具体实践中展现自我价值、担当伦理责任的核心特质。然而,步入数智时代,算法逻辑正渗透并侵蚀着这种伦理主体性,尤其对子女在孝道实践中的伦理抉择能力构成了挑战。

算法规训是消解主体性的显性原因。“规训”作为理解技术权力运作的概念,意指通过系统化的训练与约束机制,使个体行为驯服于既定的规范体系。福柯的规训理论为透视算法的权力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认为“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18]242}。其核心在于通过对个体身体、行为乃至思想的精细化调控与塑造,“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18]211}。算法规训正是这种权力形式的当代呈现。它依托于大数据建模技术,精心构建出所谓的“最优孝道”行为范式,将子女的孝道实践强行纳入预设的技术性框架。例如,有的养老服务系统可能规定子女要在特定时段向父母发送问候,或节日向父母转账一定的金额等表达孝心。此类操作,某种程度上是将个体基于情境判

断和情感驱动的自由意志压缩并限定于一个狭隘的技术性模板之中。如果子女被迫遵从由技术定义的“标准答案”,其根据具体情境动态调整、灵活应对孝道需求的能力就会被剥夺。算法由此将复杂多样、饱含情感温度的人伦互动,粗暴地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易操作的技术指标,使原本富有弹性、充满温情的道德实践空间在算法的冰冷逻辑下被挤压。如果长期处于此规训机制下,就会削弱子女独立判断与自主决策能力的伦理主体地位。

情感物化技术化表达是消解主体性的隐性原因。算法对主体性的侵蚀不仅体现于行为的显性规制,更深藏于情感领域的技物化表达形式中。算法通过预制祝福语库、赠送虚拟鲜花以及其他标准化代际互动模块等形式,展现子女对父母的孝行,这类技术依托精准的情绪识别与预设程序进行回应,例如,模仿特定人物的语气展开对话,营造出一种无须个体倾注真挚情感便能获得的理想化亲情体验。然而,这种低情感投入、高技术依赖的虚拟关系模式,会对真实的代际交往产生一定的影响,往往容易造成所谓的“孝行”与主体真实情感体验的日渐疏离。随着智能陪护设备、虚拟亲人形象等技术的兴起,这种情感物化、技术化趋势愈发显著。当子女习惯于借助物质、技术手段维系亲情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智能设备作为情感替代方案,而忽略更具实质意义的面对面陪伴与深度交流。如果长此以往,子女在现实情境中感知、表达和回应父母情感需求的能力就会逐渐弱化,传统孝道实践也就随之发生嬗变——从原本源于血缘亲情的道德责任演变为基于物质、技术途径表达的义务履行,这一转变会动摇道德实践的情感基础。

代理决策是消解主体性的深层原因。精准推送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本就担负工作、生活、养育孩子等重担的子女无须主动探询、深入理解父母的真实需求与偏好,而只需简单化地在算法提供的选项中进行被动选择。与此同时,智能养老设备、家庭健康管理 App 等技术中介,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传统孝道中子女承担的诸多尽孝职责,如健康数据监测、用药定时提醒、紧急情况呼叫响应等。伦理选择将不再是基于个体对情境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实践,而是沦为被动执行算法推荐的结果。如果长期依赖算法推荐,就会使子女丧失主动感知父母需求的能力,也无法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孝道实践。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9]主体性理论的核心要义亦在于此,即人

的主体性并非源于机械、抽象的意识活动,而是根植于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之中。如果孝道决策的场域被工具理性逻辑所主导,子女便难以基于亲情、责任、关怀等价值理性维度进行审慎的权衡与选择,子女作为伦理主体的地位在数智技术洪流中就会面临消解的困境。

(三) 制度环境层面:适配性不足引发孝道实践治理“盲区”

社会互构论指出:“现代社会生活过程是多元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构谐变过程,也是以社会行动者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为基础的转型变迁过程。”^[20]亦即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相互建构、持续互动。在此理论框架下,社会制度可以理解为既是对过往行动模式的规范化提炼,又会影响和制约着后续行动。制度设计本质上是通过规则体系(如法律、政策、文化规范)与资源分配机制(如经济条件、技术工具)的协同,持续影响并调适社会行动的方向与形态。然而,当数智技术影响孝道实践形态时,既有制度环境却显露出适配性不足:法律规制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市场逻辑冲击孝道价值根基,文化治理体系难以匹配孝道实践新形态。这三重因素相互叠加,致使孝道实践治理出现“盲区”。

法律规制的滞后性为伦理困境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法律理应为孝道实践设定基本的伦理与安全边界。然而,面对数智技术的冲击,现行法律体系显露出适应性不够问题。一是规范“盲区”的存在。数智技术在孝道领域的深度应用,催生了诸如 AI 祭祖、智能情感陪护机器人、数智化养老管理等诸多新兴实践形态。这些创新业态的法律属性、服务边界、伦理底线等核心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往往处于模糊或空白状态,导致孝道数智化实践长期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二是问责机制的缺位。当数智技术决策直接或间接引发孝道伦理伤害(如情感误导、隐私侵犯、人身损害)时,现行法律在责任追溯与认定层面面临很大困境。数智技术企业惯常以“技术中立性”作为免责盾牌,而平台、开发者、用户等多方主体之间则因权责边界不清而陷入相互推诿的僵局。受害者维权之路举步维艰。这不仅在实质上纵容了技术可能被滥用,而且在制度层面加剧了孝道实践领域的伦理失范困境。

市场逻辑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孝道的价值根基。以效率至上和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市场逻辑,

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进入孝道实践领域,影响着孝道价值内核的变化。有些科技资本敏锐地将“孝心”捕捉并包装为具有市场潜力的消费符号,通过创设“孝心会员订阅制”“孝道行为积分商城”“亲情关怀套餐”等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将基于血缘情感与伦理责任的孝道实践异化为可标价、可交易、可增值的商品与服务。这个过程不仅抽空了孝道固有的道德意涵,而且在代际之间制造了隐形的经济压力。流量导向也会扭曲孝道实践的本质,有的平台为吸引关注,获得流量,通过数智技术放大“不孝子”“啃老族”等争议话题。这样做有可能激化对立情绪,误导公众认知,对社会风气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文化治理体系的调适不足构成深层诱因。文化是孝道伦理得以生根发芽、获得社会认同的精神母体。在数智技术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既有文化治理机制面对新兴实践形态时暴露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数智化转型的步伐迟缓以及价值引导的方向偏差,客观上加剧了技术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文化阐释而言,传统孝道伦理在应对数智技术驱动的新型实践样态时,如虚拟祭扫、线上尽孝等形式,尚未形成与之匹配的阐释框架与规范体系。尽管这些创新形式拓展了孝道的实践边界,但因缺乏明确的伦理指引而引发学界与公众对于仪式正当性及情感真实性的广泛讨论。究其根本,在于当前文化治理体系未能及时构建起适应数智时代的孝道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易使相关实践在技术浪潮冲击下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

三、数智时代孝道伦理实践困境调适的路径

数智技术在推动孝道实践高效化与便捷化的同时,也衍生出诸多伦理困境与价值隐忧,亟须通过系统性的调适予以破解,可以通过驯服算法效率霸权、重拾孝道价值内涵,破除技术僭越藩篱、复归孝道主体本真,构筑伦理生态防线、涵育孝道责任沃土等途径,以此重塑适应数智时代的孝道伦理。

(一) 驯服算法效率霸权,重拾孝道价值内涵

算法秉持效率至上的准则,将复杂多维的孝道实践压缩为可量化、可交易的显性行为,这为孝道实践注入了高效动能,显著提升了实践的便捷性与规范性。然而,当这一准则被机械生硬地套用于孝道实践领域时,孝道知识被片面理解为单一维度的可操作指标,孝道所承载的尊重个体独特性、情感真实

性与情境化关怀等核心伦理价值面临被销蚀的风险,孝知由此会陷入窄化困境。驯服算法效率霸权,遏制孝知窄化的蔓延态势,需在技术逻辑层面进行根本性重构,将孝道多维价值内涵深度嵌入算法运行的逻辑链条,使算法成为伦理价值的有力承载者。

价值敏感性设计是基石所在。超越算法设计中通过量化指标提升效率的内在逻辑,亟须将孝道的情感关怀等核心价值作为内生性、基础性的约束条件,强制性地“嵌入”技术架构本身,这就要求引入价值敏感性设计理念。“价值敏感设计是一种基于理论的技术设计方法,通过概念性、经验性和技术性三种方法的迭代重复,来实现人类价值观的置入,以综合性和原则性的视角阐释和解读技术与运用过程中的人类价值。”^[21]依据这一理念,孝道的核心价值必须成为算法设计的基础性约束条件。区别于传统算法对效率与量化指标的单一追求,新算法设计的着力点在于将伦理原则深度嵌入算法的内在逻辑之中。这一转变旨在突破效率至上的思维定式,赋予算法以伦理品格,塑造其人文关怀向度。这就意味着,在算法设计过程中,必须将尊重个体生命历程的独特性、情感互动的真实性、代际之间不可推卸的长期责任承诺以及对具体情境需求的敏锐关怀等价值,内化为算法模型的核心参数与运行逻辑的边界。例如,在设计与推荐“适老服务”或“关怀方案”时,算法系统需综合考量用户的家庭结构、父母健康状况、地域文化差异、子女人力与经济资源等多重维度,而非仅依赖历史消费数据进行同质化推送。这正是关怀伦理学的实践体现。关怀伦理学明确指出,关怀应当“联系情境而不是概念做出回答,强调‘依情况而定’,指出选择如何受当事人以及情况变化的影响”^[22]。

重构价值感知系统是关键路径。当下算法系统在理解复杂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情感领域,存在一定局限。其根本症结在于过度依赖显性行为数据,这使得它既无法精准捕捉家庭关系的动态质量,也难以洞察个体深层的情感需求。破解此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构算法“感知”世界的方式,使其超越对表面、显性数据的单一依赖,转向捕捉更具伦理意涵的家庭关系动态与深层情感需求。这一转向要求算法训练范式发生根本变革,算法必须突破表层行为数据的束缚,整合能反映代际互动情境、情感流动轨迹的多维伦理数据。这不仅仅是数据采集广度的拓展,更涉及价值感知深度的革命性变革。算法需要具备理解情感互动情境、非标准化关怀表达的能力,

而非仅仅统计可量化的行为指标。具体而言,应设定阈值,限制单一类型尽孝模式(如看重物质型尽孝)在用户信息流中的过度曝光,算法应转而优先呈现那些体现高度情境适应性、个体创造性、非标准化的关怀实践例子。例如,可为异地工作的子女推荐“‘与家乡父母同步观看一部老电影并进行线上讨论’的方案”;为有特殊兴趣或需求的家庭成员设计更贴合的互动建议等。此类推荐旨在展示算法的演进方向应是构建一种能感知并尊重人类情感价值与伦理实践的“价值感知系统”。这也回应了德性伦理学对实践智慧的强调。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谋划”实践所理解的那样,“好的谋划是对有用事情的正确谋划,对应该的事情,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23]¹²⁹。因此,真正的孝道不是机械重复的程序,而是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生命关怀实践。

构建价值过滤的矫正机制是屏障。驯服算法不仅需要正向的价值引导,更需构建一套强大的矫正机制来制约,以此来主动识别并抑制将孝道简化为纯粹工具理性行为和消费符号的倾向。在当代算法推送机制中,孝道被异化为物质消费的倾向正悄然蔓延,不断消解着孝道本应具有的情感本质。正如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4]。虽然表达孝心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当孝道沦为可购买的服务商品,其承载的人伦价值便遭受了根本性颠覆。为此,算法设计应设置严格的自我纠偏参数,大幅降低物质消费导向内容的权重。但仅仅抑制负面倾向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构建并优先推荐体现非工具性价值、非标准化关怀的正向伦理实践案例库,使那些饱含情感温度的家庭故事、体现创造性关怀的特殊实践,成为算法推荐的优先选择。算法通过优先推荐这些非工具性价值的实践案例,可以对技术理性引发物化趋势的反向束缚,有助于恢复孝道应有的情感内涵与人文价值。

(二) 破除技术僭越藩篱,回归孝道主体本真

数智技术介入为子女尽孝开辟了新径,依托智能设备可精准关注父母健康,借力网络平台实现高效沟通,丰富了子女尽孝的形式。但同时潜藏着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从孝心、孝意的生成与表达看,技术依赖易消解子女对孝的深层体认,标准化的尽孝形式迫使子女拘泥程式,偏离基于真切感知与情感共鸣的尽孝要旨。长此以往,可能会削弱子女作为主体的道德判断力,影响子女伦理决策的自主性,从

而减弱子女在孝道实践中的主体性。为回归孝道行为的本真意义,使其建立在子女的主体自觉之上,需从打破技术规训、抵御情感泛物化、挣脱代理决策依赖三个维度展开。

打破技术规训,提升主体的道德判断力。技术规训的核心在于其标准化逻辑对伦理实践丰富性与情境性的压制。这种规训不仅忽视了伦理实践的情境依赖性,更将道德复杂性降维为技术可处理的简单命题。提升主体的道德判断力,首要之举是打破标准化的束缚。可以在立法上明确限制算法对孝道行为的刚性量化约束,保障子女根据具体情境来灵活践履孝道的自主空间。伦理实践的本质是情境化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23]³⁴,而中庸的判断必须基于具体情境的考量。技术应服务于情境适应,而非制造统一模板,否则将导致“道德伪善”,即行为虽符合技术标准,但却不一定符合伦理要求。同时,模糊性保护也至关重要。算法在孝道实践中宣称的确定性,实质上是对道德复杂性的否定。伦理实践告诉我们,道德判断具有“开放性”与“可错性”,任何试图终结道德争论的技术方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工具。制度设计需承认并保护孝道实践的多样性与试错过程,允许不同文化、代际、家庭背景下的伦理实践方式共存,而非用技术标准统一道德图景。另外,设置“反标准化”机制是关键一环。算法建议应限定弹性区间,为子女自定义孝道实践保留空间。例如,允许子女调整探望频率、关闭商品化孝道的推荐等,从而恢复子女在孝道实践中的情境化决策空间。这种设计并不是反对技术辅助,而是强调道德判断的最终权威应归属于人。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生活在目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25]

抵御情感物质化、技术化,回归真实伦理实践。情感物质化、技术化表现为物质与技术对情感表达的漠视与替代,使真实情感联结被虚拟互动所稀释。抵御情感物质化、技术化,一是需要明确技术辅助定位,警惕虚拟替代陷阱。技术可以模拟情感的形式,却无法复制情感的深度。因为真正的关怀需要时间沉淀、共同经历与身体在场,这是技术永远无法跨越的伦理鸿沟。可以通过立法来界定AI陪伴工具的辅助性质,禁止任何暗示其可替代真人情感联结的广告宣传。同时,强制要求算法对自动化生成的情感表达内容进行显著标注,确保用户的知情权,防止情感混淆。二是需要强化在场义务,培养真实共情

能力。技术虽能提高沟通效率,但却可能简化情感的复杂性,甚至导致“情感冷漠”。教育应着力强化子女亲身参与、直接表达关怀的核心伦理实践能力。通过倡导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参与活动等具身化方式,培养真实的共情能力与情感表达技能。

挣脱代理决策依赖,回归主体的伦理能动性。算法“黑箱”决策易导致个体的主体反思能力萎缩与伦理责任旁落。提高个体的伦理能动性,核心在于挣脱对技术代理的依赖,提升个体的主体反思能力。具体到孝道实践来说,一是强制算法决策透明化。可以通过立法要求影响孝道实践的关键算法具备必要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确保子女及父母能够理解影响孝道实践建议的核心因素、权重与逻辑推演过程。透明性不仅是技术伦理的基本要求,更是主体反思的前提,只有理解技术如何影响自己,个体才能进行更具反思性的伦理考量。二是添加反思性决策模块。伦理决策不是技术优化的结果,而是主体在价值冲突中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需要时间、反思与责任承担,而技术无法替代这一过程。在涉及养老伦理抉择的算法应用场景中,可以插入“人工确认或反思”步骤,旨在打断自动化决策,不影响主体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防止决策权让渡于技术。三是培育主体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伦理主体性的核心,它无法通过技术传授,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伦理实践与反思来培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26]。实践时可以开展以“孝道情境模拟”为核心的公民伦理教育项目,通过模拟复杂、多变的现实家庭关系与伦理困境,如多子女赡养责任分配、代际价值观冲突、有限资源下的优先性抉择等,提升子女在具体情境中进行伦理感知、权衡与决断的实践智慧。

(三) 构筑伦理生态防线,涵育孝道责任沃土

数智技术凭借虚拟属性为孝道践行带来了革新性变化。子女可借助技术打破地域与时空壁垒,与父母进行实时互动交流,使孝行突破时空局限,实现了便捷性与可及性。然而,技术主导的浪潮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这种虚拟性投射于孝行实践,导致孝行渐呈虚化态势,孝道本真面临消解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构建以“责任”为内核、以“生态”为架构的伦理环境,成为守护孝道伦理的重要社会议题。此思路突破了单纯规制技术工具理性的狭隘视野,通过法律束缚、市场约束与文化塑造的协同共治,构建起责任主体权责明晰的养老生态系统。

法律规制体现“伦理先行”原则。责任伦理学的奠基人汉斯·约纳斯曾提出“恐惧的启迪”命题,“所以道德哲学应该先于我们的希望考虑我们的恐惧,以了解我们真正渴望什么”^{[27]37}。汉斯·约纳斯主要是强调当代技术行动者必须以“对人类存续的恐惧”为伦理原动力,承担起“对尚未存在者的责任”,“在你的意志对象中,你当前的选择应该考虑到人类未来的整体”,“不要使人类得以世代生活的条件陷入危险的境地”^{[27]11}。这一思想对数智时代孝道的实践具有特殊启示,即当数智技术开始介入代际情感关系时,技术风险的伦理后果已超越代际时间维度,深远地影响着孝道伦理的持续。因此,法律规制必须践行“伦理先行”原则,将“前瞻性责任”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防止孝道实践出现异化现象。一是通过专项立法构筑责任基石。目前亟须制定“算法辅助孝道实践伦理规范”等专门法规,精准锚定数智技术开发者、运营平台及终端使用者伦理责任的分担,避免出现“责任逃逸”现象。二是法规需超越模糊的伦理倡导。设定清晰、可操作的追要要件与标准,尤其聚焦于歧视性算法推荐、情感操控、隐私大规模泄露等可预见的重大伦理风险。这种制度安排迫使技术行动者必须正视其行为的长远伦理后果,从源头遏制技术傲慢。三是伦理评估前置。借鉴成熟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建立算法伦理风险评估的强制性前置程序。评估的核心焦点应置于技术应用对孝道伦理核心价值的潜在冲击上,如算法推荐是否会固化或加剧代际刻板印象?虚拟照护模式是否可能导致真实情感联结的疏离与削弱?这些措施将系统性的伦理审查嵌入技术生命周期的关键点,可从源头上阻断高风险技术的扩散路径。

遏制市场逻辑的伦理僭越。现代社会中市场逻辑对生活世界形成了挤压。孝道作为基于血缘与情感的非交换性伦理实践,其神圣性正面临资本逻辑的“僭越”,存在被异化为可交易商品的风险。而制度治理的核心在于引入责任伦理,严格划定市场逻辑的适用边界,防止其以“效率”之名侵蚀孝道的伦理根基。责任伦理强调行为主体应对其行动的可预见后果承担义务,尤其适用于应对系统性机制对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威胁。一是设置金融化与商业化的伦理禁令。立法者要有预见并防止孝道行为被异化为金融交易对象的责任感,防止将代际情感关系“计量化”。此举是对资本逻辑“僭越”伦理的有序阻断,体现了对孝道“无偿性”与“情感性”本质的制

度性捍卫。二是建立动态监测与实质性审查机制。责任伦理强调对行为远期影响的持续关注,监管者需主动审查以“孝道”为噱头的营销行为,重点遏制算法放大孝道焦虑、诱导非理性消费的商业策略。这既是对所警示的伦理价值消解风险的回应,也是对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责任性约束。三是构建平台流量的伦理治理机制是责任伦理的技术性延伸。平台作为技术权力的持有者,有责任将伦理敏感性参数内嵌于算法设计,对渲染代际冲突、孝道焦虑的内容进行降权处理。监管部门可通过引入伦理影响系数作为平台考核指标,将算法伦理表现与平台运营资质挂钩,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可以约束算法权力的无边界扩张,维护代际关系的伦理完整性与社会公平。

创新文化治理方式。文化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引导,实现孝道伦理从“传统形态”向“数字形态”的适应性转化。一是制定具有引导责任的数字孝道伦理指南。可以由权威机构牵头制定“数智时代孝道伦理实践指南”等,阐释传统孝道在虚拟空间中的转化路径与实践规范。“指南”可以对“虚拟祭扫”“远程情感照护”“AI陪伴”等新兴实践形式的伦理正当性边界与责任导向进行划定。这样通过深度的责任伦理反思与共识凝聚,可为公众在数字语境下的孝道实践提供价值指引。二是超越计算理性,重构责任导向的孝道评价体系。当算法技术倾向于将孝道简化为可量化指标时,孝道的丰富伦理意涵被窄化。德性伦理学给予的启示是:真正的孝道评价应聚焦于行动者真诚、关怀、耐心的品格以及代际情感联结的质量与沟通的深度。因此,文化治理应推动建立以责任共情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关注子女是否敏锐体察父母的情感变化,沟通中是否体现尊重与温暖。这样,孝道实践才能从技术的量化束缚中解脱出来,保持其应有的伦理温度。

结 语

数智时代传统孝道实践遇到的困境,实质上是算法逻辑、资本逻辑与流量经济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技术本身虽无价值倾向,但当孝道实践被简化为算法评分体系中的量化指标、直播场景中的展演性互动或人工智能语音的程式化响应时,人们亟须在技术系统内重新嵌入人文价值。实践表明,再精密的算法模型也难以复现深夜病榻前递上的那杯温水所蕴含的温情、离家时父母欲言又止的关切目光以及

传统节庆中家人围坐共叙家史的仪式感。因此,数智时代更好地践行孝道伦理,关键在于促成技术理性与伦理理性的调和,技术不应消解孝道的情感深度与人伦光辉,而应成为滋养其文明内涵的积极力量。在数智浪潮的冲击下,技术唯有谦逊地服务于人伦价值的深化,古老的“善事父母”之美德方能在新技术语境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2025-07-25)[2025-07-25].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6135/content.html.

[2]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02-28].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3] 王莹.遮蔽与解蔽:智能传播时代孝文化的流失与重构[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3(3):22-28.

[4] 张颖.“AI-阿铁”可以行孝吗?——机器人护理对医学/生命伦理学的挑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2(7):879-896.

[5] 王亮.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1):56-61.

[6] 王健,林津如.护理机器人补位子女养老的伦理风险及其防范[J].道德与文明,2019(3):131-137.

[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313-314.

[8] 礼记·孝经[M].胡平生,陈美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0] 盐铁论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285.

[11] 诗经[M].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474-475.

[12] 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何池.AI假靳东,求你别再骗奶奶[EB/OL].(2025-03-12)[2025-03-1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364936.

[14]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64.

[15] 李伦,张晓燕.算法不公正:问题类型与治理路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5):76-83.

[16] Gillespie T, Boczkowski P, Foot K.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167-194.

[17] 凌应生.论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冲击及应对[J].理论视野,2025(4):66-71.

[18]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20]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26.

[21] 周云倩,张纪刚.价值敏感设计:内容推荐算法进阶之路[J].中国出版,2022(10):40-45.

[22]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7.

[2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2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95.

[26]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75.

[27] 约纳斯.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M].方秋明,译.香港:世纪出版社,2013.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Adjustment Paths of Filial Piety Ethic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You Wubing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has injected unprecedented technological impetus into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lligent devices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and accessibi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blazing new trails for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ethics. However, as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creasingly integrate into the care relationship for the elderly,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ethics also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By examin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ilial piety - “filial knowledge, filial emotion, filial intention, and filial action” -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narrowing of filial knowledge, dilution of filial emotion, weakening of filial inten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filial action”. The root causes lie in the obscuring of ethical logic by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the technological dissolu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o break through this modern predicament, it is possible to tame the hegemony of algorithmic efficiency, retriev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filial piety,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echnological overreach, resto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ubject of filial piety, build an ethical ecological defense line, and cultivate the fertile ground of filial responsibility. These measures enable us to reshape filial piety ethics to adapt to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In conclusion, the inheritance of filial piety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requires embedding humanistic spirit in technology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reby safeguarding the ethical core of “serving parents well”.

Key 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ethics

责任编辑:思 齐